

传统的发明：抗战时期孔子诞辰纪念日研究*

郭辉

[摘要] 全面抗战爆发前夕，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为了应对民族危机而创制孔子诞辰纪念日，与传统祀孔行为相较，其形式发生了变化，意义蕴涵也更加丰富，为抗日战争提供了精神支持。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在孔子诞生地曲阜和首都南京，于孔子诞辰纪念日举行纪念仪式活动，形象鲜明地表达出对孔子的纪念以及对孔子所代表的传统文化的运作。孔子思想通过孔子诞辰纪念被重新阐释和发挥，与恢复民族自信力、“安内攘外”、新生活运动、孙中山及其三民主义产生密切联系。孔子诞辰纪念日只是被当做现实政治诉求的表达途径，失去了其应有的内容。抗战时期的孔子诞辰纪念日旨在为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统治合法性提供资源，树立权威，以求国家危机时刻能够维持正常统治秩序，但实际效果有限。

[关键词] 抗日战争 孔子诞辰纪念日 国民党 传统

[中图分类号] K26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14) 07-0104-09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面临严重国难，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统治受到巨大挑战和威胁，因而不得不恢复传统以作为统治策略。但凡民族或国家危难之时，传统即充当重要资源，为现实政治提供滋养，此时的传统实际上为现实诉求需要而被重新阐释，故称之为“传统的发明”，^[1] 这些“‘被发明’的传统是文化工程师们深思熟虑和固定的创作，这些工程师们伪造象征物、仪式、神话和历史，以适合工业和民主动员的需要以及被政治化的现代大众的需要。换句话说，‘被发明的传统’是统治阶级别有用心社会控制工具”。^[2] 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利用传统文化进行一系列发明，不仅恢复自民国成立以来即废除的国家黄帝祭祀，^[3] 也恢复其统治之初废止的国家祀孔，将之制作成颇具现代意义的孔子诞辰纪念日，与传统祀孔行为存有明显差别。

孔子诞辰纪念日除表面延续尊孔外，采取新式的纪念日形式。孔子诞辰纪念日作为“被发明的传统”，应时势需求而生，创立之目的与考量即为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提供精神支持，以渡过抗战危难时期。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通过孔子诞辰纪念日诠释孔子思想，将之与现实政治相联系，树立统治权威，制造自身政权合法性，以确保民族危机下国家的统治和控制。学界或限于对1934年首次孔子诞辰纪念活动的考察，或从祭祀文化角度审视国民党与南京国民政府对孔子的祭祀典礼。^① 这些研究尚未系统梳理孔子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抗战时期国家纪念日研究”(13CZS037)、中国博士后基金项目“民族危机下的节日政治：抗战时期国家纪念日研究”(2013M530834)、湖南师范大学博士启动项目“国家纪念日与民国政治文化”(2012BQ2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郭辉，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后研究人员（湖南长沙，410081）。

^① 主要有徐国磊：《1934年南京国民政府纪念孔子诞辰纪念活动的历史考察》，四川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

诞辰纪念日，且未能与时局相联系以揭示纪念日背后的深层次内涵和意蕴。鉴于此，本文拟以“传统的发明”为视角，通过全面考察孔子诞辰纪念日的创制、仪式操演、仪式语言、象征意义等，探析这一国家纪念日被赋予的内容和时代意义，以解读民族危难之际国家对传统的运用和操作。

一、孔子诞辰纪念日的创制

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初，即主张废止“尊孔读经”。教育部于1912年1月19日颁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规定“小学读经科一律废止”，^[4]以符“共和”宗旨。时任教育部部长的蔡元培指出：尊孔为“满清时代”钦定教育宗旨之一，但与民国“信教自由相违”，不过“孔子之学术，与后世所谓儒教、孔教当分别论之。嗣后教育界何以处孔子，及何以处孔教，当特别讨论之”。^[5]蔡元培主张废止尊孔，但并不排斥“孔子之学术”。

袁世凯当选为第二任临时大总统后，教育部在小学教育中重申“废止读经”，但此时出现复古潮流。1912年7月，教育部临时教育会议针对学校可拜孔子提案，考虑到“恐怕引起社会上无谓之风潮”，仍将“孔子诞辰日”列入学校自定仪式。^[6]后教育部通电规定：阳历10月7日为孔子诞辰，全国各校届时举行纪念会，得到各地教育界及工商各界积极响应。^[7]10月，教育部收到各处电询祀孔事，答称：“崇祀孔子问题，及祀孔如何订定，事关民国前途至巨，非俟将来正式国会议决后，不能草率从事”，希望自民国元年始，以纪念会方式替代。^[8]废除祀孔后，北京政府试图采取“诞辰日纪念”形式尊崇孔子。

1913年初，北京政府征集国民祀孔意见。6月22日袁世凯发布《尊崇孔圣令》，虽此时“征集多数国民祀孔意见”“尚未复齐”，但对祀孔已有主张：“近自国体改革，缔造共和，或谓孔子言制大一统而辨等威，疑其说与今之平等自由不合，浅妄者流至悍然倡为废祀之说，此不独无以识孔学之精微，即于平等自由之真相亦未有当也”，决定“查照民国体制，根据古义，将祀孔子典礼，折衷至当，详细规定，以表尊崇，而垂久远”。^[9]国家祀孔的制度化提上日程。

有众议院议员质疑以总统命令裁制祀孔，向国务院提出质问书，认为“祀孔典礼之命令”“违背约法之信教自由”，“断不能以总统命令稍加裁制”。且与教育部之前颁令不相符合，原拟“俟将来正式国会议决”，而今却蔑视约法，蔑视民意机关，变更通令，“是名为征集各省官厅之意见”，实“欲妄逞政府独断之威权”。内务部对此称“无答复之必要”。^[10]袁世凯政府依靠部分“民意”独断制定祀孔，且在相关政策上急于恢复国家祀孔，难免招致部分人批评。与众议院主要责怪袁政府未能充分尊重民意不同，上海《中华民报》揭露出袁世凯之用意在于欲利用“孔子力倡尊王之说”“以恢复人民服从专制之心理”，^[11]无情披露袁世凯恢复祀孔本意。1913年9月17日孔子诞日将至，原已拟订每年阳历10月7日永为孔子诞日纪念之期，但教育部通电，因祀孔典礼尚未规定，而旧历八月二十七日孔子生日，应定为圣节。虽“民国缔造，改行阳历，一切允宜遵从。惟孔子生日，既从夏正考定，自不得不溯从夏正，否则恒致抵牾，转近诬妄。嗣后各校应永依旧历八月二十七日行礼”，并进一步解释道：新旧历互用，在成周已有先例，条教号令，从阳历者，所以遵时制；从夏正者，所以遵先师，道可并行，义非相悖。^[12]政府逐渐恢复传统，包括孔诞日纪念使用夏历。

1913年11月26日，袁世凯发布尊孔典礼令。年底，袁世凯向政治会议提交祭孔典礼案，经过讨论后颁布《祀孔案审查报告书》，说明祀孔相关内容。^[13]1914年2月7日，袁世凯发布规复祭孔令，肯定报告书内容。^[14]国家祀孔消失两年多后正式恢复。北京政府一直延续国家祀孔，祀孔经过改头换面重新登上舞台，京师文庙祀孔由以前的皇帝改为总统主祭。

北京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政权更替之际，地方政府对祀孔问题的处理左右为难。国民政府对孔子的政策尚未公布，而摆在眼前的祀孔迫在眉睫。1927年8月，福建省政府主席杨树庄暨各委员呈请中央

孔凡岭：《略论南京政府首次纪念孔子诞辰活动》，《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3期；李俊领：《抗战时期国民党与南京国民政府对孔子的祭祀典礼》，《社会科学评论》2008年第4期。

通令各省祭孔，电文称：“孔子本时中之圣，为万世之师，凡有血气莫不尊亲”，而“民国成立，率循旧章，春秋上丁，全国致祭”。如今“中央政府致力北伐工作，期在统一。民国对于各项祭典，一时虽未有规定明文，而孔孟学说实足以维系人心，巩固国本，地方官似应亟予维持，以安大局”。希望中央政府就“祭圣典礼”制定相关政策并通行各省。^[15]福建省政府态度明确，新政权也不能忽视孔子祭典，希望延续北京政府惯有政策。不管地方抑或中央，都愿意继承“民国”称号，此为南京国民政府在政权合法性建设上所面临的困境，力图创制革新的同时，必须面对北京政府的民国遗产。

南京国民政府在教育方面裁撤教育行政委员会，推行大学院制度。中华民国大学院于1927年10月在南京建立，为全国最高学术及教育行政机构，相当于北京政府的教育部，祀孔之事转而由大学院处理。1928年2月18日，大学院第169号训令，令各大学各省教育厅及各特别市教育局“废止春秋祀孔旧典”，将春秋祀孔称为“旧典”“旧制”，肯定孔子作为“布衣讲学”的“人格学问”。但其“尊王忠君一点”“实与现代思想自由原则，及本党主义，大相悖谬”，祀孔“亟行废止”，“以昭示国民”。^[16]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即主张废止祀孔的蔡元培任大学院院长，对待孔子的态度和思想自然影响到大学院行动和政策。大学院虽发布训令禁止春秋丁祀孔，但社会上不乏抵制者。2月27日，阴历上丁释奠之期，上海绅学两界同人齐集孔庙举行致祭，祭品除牛羊外，其他如鱼肉筍豆菜酒照旧供设。^[17]

还有不少反对者直接致电国民政府要求取消大学院废止祀孔令。如四川省东川道儒家分会针对大学院废止祀孔令，批评“大学院者乃一国最高学府，重在研精学理，实验致用，而非于世人崇拜先圣之典仪无端加以干涉而取消之，遂认为大学院之职责也”。同时，孙中山三民主义“常引孔子之言，以为证其明征也”。大学院所指“祀孔之举与现代思想自由原则及本党主义大相悖谬”，实际是“不明大体”，对“祀孔不过三鞠躬耳，并未束缚其思想，与思想自由何涉。且遍寻本党主义，书中亦无禁止祀孔一事，何至遽云悖谬”。希望国民政府对“大学院放肆无忌束缚人民之崇圣思想”行为加以管制。^[18]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军第七师师长蓝文彬、副师长饶国华等人，认为万世师表的“孔子富于革命思想，而与时代潮流，本党主义大相温和也”。“孔子与现代思潮，不惟无丝毫违反，实为吾党先知先觉，造其端而立其极者也”。且孙中山“有恢复旧道德之先见，而无时不尊称孔子，取法示人”。大学院出此谬论，真是“丧失人心，藉非别有用意，何至狂悖如斯，拟请通令全国取消该大学院乱令，恢复祀孔，以顺輿情”。^①同时还有中华总商会、爪哇泗水文庙董事李双辉等国内和海外华人团体呈请反对废止祀孔。

大学院始末料一纸废止春秋丁祀孔的训令会引起如此多反对和批评。大学院训令褒赞孔子人格学问，但在人们眼中却是强调废止祀孔。大学院此后就爪哇泗水文庙董事李双辉的呈请做出详释：“孔学与祀孔，本各为一问题。孔学流传至今，自有其相当历史。其学说除关于尊王忠君及与现代思潮相刺谬者外，民众尽可自由研求，本院并未禁止；至祀孔则系帝王遗制，从前军阀别有用心，遂亦沿用不废，现在律以世界思潮及本党主义，当然不容该项祀典之仍存，与今日之不举行关岳祀典，同一意义。”^[19]大学院肯定孔子和孔学的地位与价值，不过认为祀孔行为乃帝王遗制，甚而与军阀有联系。假若站在新政权立场，倒可同情其态度，希望尽可能避免旧政权的继续影响。大学院区分孔子思想与崇孔方式的用意明确，但社会难以承受突来的遽变。

1928年，时任国民政府湖南省主席何健与前主席鲁涤平等呈请明定孔子祀典，国民政府内政部会同大学院呈准，为缓解社会矛盾，借此于1928年10月7日规定：以孔子诞日为纪念日（阳历），通行全国一体遵照，并于是日举行纪念时演说孔子言行事迹，仪式不必规定。^[20]长沙孔道学校创办人任福黎在《乙亥夏历孔诞祭祀纪言》中道出此事原委：“民国十七年（1928）……停止祀祭……耆绅罗先闾、

^①《蓝文彬、饶国华等要求国民政府通令全国取消大学院废止祀孔令的快邮代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文化（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516-518页。此档案署日期为“1927年5月7日”，恐有误，因大学院废止祀孔令发布于1928年，“1927年”应为“1928年”。

彭清黎、王寿慈等，首先函请政府恢复孔子祀典，……有陈朝爵、王之平等，函电力争，终无挽于停祀之念。于是孔道学校，约集士绅，创设民间祭祀，须臾釀资三百金，饩羊告朔，聊胜于无，足见三代直道，自在人心。政府闻之，亦且惕然生感，前主席沪庵鲁公，今主席芸樵何公，咸遣人达意，欲加入民众祭祀，并循例由财厅拨发祭款三百金，官民合办，共得六百元。趋跑俎豆，乐备礼明，开从前未有之盛，而鲁何二公，又发电中央，据理力争，遂得大学院令，以孔子诞日为纪念日，演讲二小时，通电直省遵行，虽未能即行恢复春秋丁祭，而诞辰纪念，从此发轫，尚为不幸中之幸。”^[21] 国民政府虽未将孔子诞辰纪念作为国家层面纪念日，但已给予尊孔活动合法地位，且用孔子诞辰纪念代替春秋祀孔，带给祀孔人士些许安慰。

1931年日本军国主义人士发动“九·一八事变”，开始大规模侵华运动，东三省沦陷，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统治面临巨大挑战和危机。政权面对困境，一方面利用现实事件开展纪念活动，以凝聚人心，^[22]一方面容易引起对传统的眷恋，从中寻求可资利用的执政资源，作为传统文化代表的孔子自然受到关注。孔子及其祀典本为不少人重视，具有一定社会基础，且国家对孔诞已做出规定，只是未上升到国家层面。有论者指出：“随着国内国际形势的进一步变化，以及当政要人对‘固有道德’的推崇和提倡，为了‘恢复固有的道德’和‘恢复固有文化’，在民众中建立新的道德规范，进而‘恢复民族固有的地位’，尊孔读经的兴起，由政府亲自主持孔子诞辰纪念已经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23] 邵元冲有言：“中樞为倡导国民培养精神上之人格，遂以八月二十七日孔子诞辰定为先师孔子纪念日，以阐扬孔子之学说。”虽孔子诞辰有数说，但以“阴历八月二十七日”之说为确，“今以阳历代之者，盖取便习惯也。”^[24]

1934年6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准蒋介石、戴传贤、汪精卫、叶楚伦四委员提议，议决将每年阳历8月27日“先师孔子诞辰纪念日”定为“国定纪念日”，由“国民政府明令公布，并交宣传委员会拟定纪念办法”。^[25] 随即，中央宣传委员会会商内政、教育两部^①拟具“先师孔子诞辰纪念办法附纪念会秩序单”，中执会则进一步令“教育部制定孔子纪念歌”，通过的孔子纪念办法包括：纪念日期、纪念日名称、孔子事略、纪念仪式、宣传要点等。纪念会秩序：1、全体肃立；2、奏乐；3、唱党歌；4、向党国旗总理遗像及孔子遗像行三鞠躬礼；5、主席恭读总理遗嘱；6、主席报告纪念孔子之意义；7、演讲；8、唱孔子纪念歌；9、奏乐；10、礼成。^[26] 后国民党中执会颁发“孔子纪念歌”，歌词为“礼记礼运篇天下为公一段”，因其“最合人类社会思想，其伟大纪念含义，实为三民主义之基础”，定名为“天下为公歌”。^[27] 国民党与国民政府将孔子诞辰纪念日上升至国家层面定为“国定纪念日”，将之作为国家统治策略资源。孔子诞辰纪念日与传统春秋丁祀孔相较已发生变化，具有典型现代形式和时代意义。

二、纪念仪式的举行

1934年8月27日，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隆重举行第一个国定孔子诞辰纪念日，国民政府创造性地在孔子圣地曲阜和首都南京两地进行。此种纪念方式为国家对历史传统资源的明确征用，国家权力不仅深入到先圣故地，且在国家行政权力集中地南京也举行类似纪念活动。

1934年8月27日晨7时，祭孔典礼在曲阜孔庙大成殿举行。国民政府暨各院部会前来致祭人员，于清晨4时用早餐后分乘汽车赴曲阜孔庙。车抵曲阜时，天方破晓，曲阜县举办数十年来未有之盛典，观者万人空巷，各街均悬旗贴标语。曲阜各界及孔氏族人约数千余人，均在庙鹄候，庙前观者尤为拥挤。杏坛前为曲阜各界代表及孔氏族人，祭礼席均标明地位，地下铺红毯及蒲席，预备行家祭时用。大成殿石级下执事40人，分列两旁，均戴青方巾，衣紫花袍，手持羽修。大成殿门前铺花毛毯为主祭陪祭官席位。

参与典礼的国府暨各院部会代表有：国府代表叶楚伦、行政院代表褚民谊、立法院代表彭养光、司

^①因大学院经费过于庞大、事权不统一等因素，蔡元培不得不于1928年10月6日辞去院长职务，转由蒋梦麟担任。1928年10月24日大学院裁撤，所有改革制度取消，恢复教育部与旧有教育制度。

法院代表陈箇民、考试院代表王用宾、监察院代表郑寿荃、内政部代表傅汝霖、教育部代表雷震等，并与其他陪祭与祭人员共分六行于大成殿前肃立。右旁为军乐队，左为与祭妇女。首先奏乐，唱国歌，由叶楚伦献花圈，中央典礼局局长柴祖荫读祝文，继行三鞠躬礼，奏古乐，奏乐毕，再行一鞠躬礼，礼成摄影。公祭后为家祭，在杏坛前香炉正中甬道，由孔子七十七代孙孔德成主祭。其余族人，悉立两边，乐舞生持干羽在台之正中。赞礼者四员，殿内外各一，并有在杏坛前者。礼节：1、香献；2、初献；3、献帛；4、读祝文；5、亚献；6、饮福；7、赐禄。行礼时，先在杏坛前九叩首，由西侧升阶至殿内九叩，敬香，再九叩，退回原处。每一礼节均由乐舞生奏乐，10点家祭完。

同日，国民政府与国民党中央在中央党部合并举行先师孔子诞辰纪念典礼。党部内外满布花采，礼堂内悬红纸金字标语，总理像前桌上置有孔子遗像。到中央委员汪精卫、居正、戴传贤、陈公博、方觉慧、陈树人、萧忠贞、谷正纲、洪陆东、段锡朋、王祺、朱培德、张道藩、邓飞黄、朱霁青及国府文官长魏怀、主计长陈其采，各院部会代表陈绍宽、钮永建、李元鼎、陈大齐、何玉书、许崇灏、郑螺生、滕固、张炯等，暨党部全体工作人员等约千余人。8时正，奏乐开会。秩序：1、全体肃立；2、奏乐；3、唱党歌；4、向总理遗像暨孔子遗像行三鞠躬礼；5、静默三分钟；6、主席报告纪念孔子诞辰意义；7、演讲；8、奏乐；9、礼成。由汪精卫主席，领导行礼如仪后即席报告，继由戴传贤演讲，词毕，即奏乐，宣告散会。另外，南京各机关与全国各地地方皆举行孔子诞辰纪念，^[28]全国掀起孔诞纪念热潮。

1935年孔子诞辰纪念已从热潮中冷却。中央、国府于8月27日上午8时在中央党部大礼堂合并举行孔子诞辰纪念大会。出席中央委员居正、叶楚伦等，及国民政府各处局长，暨中央党部全体工作人员共约700人，由居正主席，叶楚伦报告。叶氏词毕近9时，即宣告礼成散会。^[29]中央特派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主祭曲阜祭孔大典。27日晨7时在大成殿前举行，到机关团体代表、各学校、孔氏族人共千余人。^[30]就纪念仪式操演和各方情况而言，场面显然不如首届孔子诞辰纪念日，曲阜祭孔大典中央未派员往曲阜祭孔，由地方行政长官代祭。

1936年孔子诞辰纪念与1935年类似，中央、国府于8月27日晨8时在中央党部大礼堂合并举行，到有中委、国府暨各院部会代表、中央各处部会工作人员共计700余人。曲阜祭孔大典由韩复榘代祭，27日晨7时在圣庙大成殿行礼。秩序：1、肃立；2、奏乐；3、唱党歌；4、献花；5、读祝文；6、行三鞠躬礼；7、奏乐；8、行一鞠躬礼；9、礼成摄影。^[31]纪念仪式形式化。

1937年孔子诞辰纪念日韩复榘代表国府前往曲阜举行祭孔大典。因1937年9月日军侵入山东境内，蒋介石令韩复榘在日军进犯曲阜前将孔德成护送到安全之处，免遭日本人挟持。后孔德成南去，在武汉发表抗日宣言。曲阜沦陷意味着每年孔诞纪念日在孔子圣地举行的祭孔大典无法正常举行，而自然中断。1937年年底南京沦陷，1938年孔子诞辰纪念日只能在陪都重庆文庙举行典礼。国家危难之际祀孔典礼的照常举行，表明国家的重视，正因国难才需要借助传统凝聚人心，为抗战提供精神鼓动和支持，进行抗战动员。当然，仪式被简化，国家没有多余的人力、物力进行壮烈隆重的操演。

1939年孔子诞辰纪念日，中央、国府于上午8时在国府大礼堂合并举行，到中委孔祥熙等人，另孔圣奉祀官孔德成也与会，由孔祥熙主席，领导行礼如仪，孔祥熙作“孔子遗教与民族前途”的演讲。^[32]1940年中央、国府联合举行孔子诞辰纪念会，到中央委员各院部会首长暨中枢工作人员300余人，孔圣奉祀官孔德成莅临参加，张继主席，领导行礼，李文范及孔德成相继演讲，阐扬孔子学说。^[33]1941年中央、国府纪念孔子诞辰在国民政府礼堂举行。到各中委、孔奉祀官孔德成、各机关首长及代表等300余人，蒋介石主席，领导行礼如仪，由孔祥熙报告孔子学说。^[34]1942年中央、国府联合举行孔子诞辰纪念，孔祥熙报告纪念孔诞意义。^[35]1943年中央、国府在军事委员会科学礼堂纪念孔子诞辰，蒋介石领导行礼后，孔祥熙作报告。^[36]

战时能保持孔诞纪念，尚属不易。国难产生并提供孔子诞辰纪念持续不断的动力来源，纪念具有强烈针对性和现实感。不过，纪念整体有简化趋向，观其原因：国民党中央与国民政府主观积极性降低，

首次国定孔子诞辰纪念日后即如此；政治局势影响到纪念活动，战时人员安排、民众心理等各方面都难以正常协调；纪念活动本身程式化，使之缺乏创新和新鲜感，年年重复操演而难免形式化；教师节并行也降低孔子诞辰纪念积极性。

1939年5月，教育部致行政院呈，拟定孔子诞辰8月27日为教师节：“窃维尊师崇道，振古如兹。我大成至圣先师孔子，承唐虞三代之宏规，为万世人伦之师表，在中国文化学术与民族历史上，固已金声玉振，继往开来，即在世界历史上，亦若景行高山，为贤哲之所向往。际今民族复兴，期止至善，允宜恭藉诞辰，定为佳节，冀于兆氏康乐之中，深寓景仰至圣之意，谨拟定每年八月二十七日为教师节，既以表彰圣德，亦以振奋群伦。”^[37]教师节并行影响到孔子诞辰纪念资源分配，却丰富了孔子诞辰日活动和意义。

第一届教师节与孔子诞辰纪念日分别举行。^[38]此后政策一直未将教师节与孔子诞辰纪念日合并，但从实际操作看，某些地方或团体为节省“一日双节”所需的执行资源，仍将两节合并举行。如1940年第二届教师节，上海各级学校纪念孔子诞辰并热烈庆祝教师节，全市各界学校放假一天，悬旗庆祝，并演讲孔子事迹；^[39]而陪都重庆各界悬旗休假，庆祝孔子诞辰暨教师节；长沙教育界举行孔子诞辰暨教师节纪念。^[40]国家层面教师节活动没有严格规定，纪念形式较为灵活，实际运作亦如此。如1943年教师节，教育部对做出贡献的教授和专家学者颁发奖状奖金。^[41]国家对教师节不像孔子诞辰纪念举行划一的纪念仪式。因教师节纪念形式多样，虽分散国家与社会的孔子诞辰纪念投入，却大大丰富孔子诞辰纪念日，为原本趋于单调的孔子诞辰纪念日注入新活力，教师节的并行客观上扩大孔子诞辰纪念日的意义，丰富其意义。

三、孔子思想的时代阐释

“九·一八事变”后，国家面临空前国难，“值兹中国国家民族频于危急之秋，非提倡中国固有之道德不可，我国相传有四千余年之历史，值得敬仰崇拜之先哲固不少，而以孔子为最，孔子为我国历史上继往开来之最大圣人。”^[42]国家希望能够利用人们对传统的共同体验，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振奋民族精神以抗击外患。民族构成的主要因素，除了“共同之言语文字外，当推共同之历史矣，而历史之中，最能使人深印脑际萦迴不忘者，又无过于历史中之伟大人格与其言行”。^[43]孔子诞辰纪念是为“纪念孔子崇高伟大之人格，阐扬孔子博大精深的学说，振发萎靡浮薄之民心，挽救行将中绝的文化。我们全国民众，逢此圣诞，继往开来，应该如何猛省策励，承继先师孔子之遗志，负起大家历史的使命”。^[44]孔子及其学说担负着挽救国家于危难的时代使命，并为现实提供可资利用的历史资源。

特殊历史背景下，通过孔子诞辰纪念日对孔子思想进行时代阐释成为当务之急。

一是用孔子思想恢复民族自信力。尊重历史伟人实际是“欲以民族过去之伟大，唤起其今后之自信力，使之继往开来，以竞存于今日之世界”，而“我国过去文化之灿烂，历史之悠久，伟大人物之众多，以与世界任何一国比较，绝无逊色。值兹国势凌夷，外患交迫，民族情感散漫已极之今日，选择一二历史上值得崇拜之伟大人物，定期纪念，用以振奋民族颓唐之气”。^[45]借伟大人物光辉灿烂之历史凝聚民族感情，树立民族自信力，此时期能够“振奋民族颓唐之气”的不二人选即孔子，如今“我国固有之道德颓荡已久，而使民族精神一蹶不振，故欲挽救之，则孔子之道德学术，应重新求其发扬光大之”。^[46]孔子思想作为民族文化代表，提倡之以恢复民族自信力，表明中国有此值得自豪之文化，能与世界媲美，成为民族危难下团结人心的向心力。正所谓需要“以孔子自强不息之精神，发奋忘食，以求智识之充实，科学之昌明”，^[47]恢复民族自信力最终是为实现民族复兴。孔祥熙指出：“古今来一国之所以立，民族之所以兴，必须有一种精神力量的存在。”此种精神力量的产生“乃是由孔子遗教而来”，且“我国文化的发扬，民族精神的培养，社会人心的维系，以及一切治国安邦的论理与方法，无不导源于孔子遗教”。发扬孔子遗教中最为人所道的“继往开来”、“有教无类”、“制度完美”等，将“厚植国基，复兴民族”。^[48]孔子遗教即孔子思想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崇高地位，为保中华民族之不堕提供“精神力量”，且具

有很强现实意义与价值，为国家行政提供思想理论支持，为“立国之本”，有助于民族复兴。

二是用孔子思想论证“安内攘外”。孔子“尊王”“攘夷”思想被挖掘出来，为国民党与国民政府“安内攘外”服务。时人将孔子主张解释为“不独在求中国之统一，同时更在求中国内战之废除”。^[49]此具有强烈现实意义，将孔子思想与时局结合。有人认为孔子学说“虽然千言万语”，但孔子的目标简而言之只有两个，一个是“尊王”，即“掩护中央，实现国家的统一”；一个是“攘夷”，即“抵抗外侮完成民族独立”。孔子针对“政局混乱，纪纲丧尽”，提出“尊王”目标，将“君同臣的名分，严格的规定，要大家一致拥护当时的中央政府——周室，当时的最高政治领袖——周王。因为只有这样，才是国家统一，和政治上轨道的象征”。但“孔子的‘尊王’是主张贤人政治，不是主张暴君专制”，是“要有个开明的政府，树立政治的中心”。论者利用孔子思想服务现实政治，阐释政策的正当合理性。孔子“攘夷”思想不是“闭关思想，或者排外行动，甚至于帝国主义。他乃是抵抗外族，并不是侵略外族”。他提倡“保存中国本位的文化，进一步向外族作文化上的灌输”。“攘夷”之“夷”是指“文化上的差异，人格原是平等的”。孔子“攘夷”思想本质上乃文化民族主义，正是“中国而夷狄而夷狄之，夷狄而中国则中国之”。^[50]当时政治形势下，“攘夷”成主务，民族危难促使国人从传统思想资源中寻求应对方法。

三是用孔子思想配合新生活运动。国民党与国民政府提倡的新生活运动是“恢复民族固有道德，以整齐简朴为规律，以礼义廉耻为鹄的”。^[51]新生活的兴起与功用是求“国民心理和生活的改造，以培养一种与新的法治社会相适应的生活和习惯，而新生活的基本原则，就是‘礼义廉耻’，于此更是可见孔子的礼教，正适合于中国目前社会的需要”。新生活运动提倡的“礼义廉耻”与孔子礼教有切合之处。礼义廉耻是“孔子学术的中心，在当初是有用的真理，到现在还是一样的要讲求，所以在现在，礼义廉耻便是新生活运动的精神信条。从前孔子提倡的，到现在我们还要提倡。因为没有礼义廉耻，这个国家社会就凌乱了”。礼义廉耻乃“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所以说真理是千古不变的，不要以为我们是复古，或者以为是封建思想，那就错了”。^[52]正因提倡新生活运动，极力肯定孔子思想、礼教的现代价值。如将“义”解释为“服务的精神”和“牺牲的精神”，以“牺牲自己，成就他人，为国家社会牺牲”；将“耻”解释为“有报仇雪耻的勇气。我国国耻重重，至今未雪，实由国人多不知耻，多是无耻的缘故”。^[53]此皆为出于现实要求对“礼义廉耻”做出的新解释，不仅服务于新生活运动，也服务于社会。

四是用孔子思想宣传孙中山及其三民主义。国民党与国民政府自设置孔子诞辰纪念日起，即有意将孔子与孙中山联系，孔子诞辰纪念办法中，宣传要点包括：“一、讲述孔子生平事略；二、讲述孔子学说；三、讲述国父孙中山先生革命思想与孔子之关系。”^[54]“讲述”孙中山思想与孔子的关系，如此硬性规定实将孙中山孔子化、三民主义儒学化，将孔子和孔子思想纳入国家意识形态范畴。三民主义与孔子学说间的关系被广泛言说。孙中山晚年对孔子思想关注颇多，自称其思想继承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的轨道“来发扬光大”。有人称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是集合古今中外学术思想的精华而成的，然就其所受各种学术思想的影响言，仍以中国正统的儒家哲学为最要”。^[55]三民主义基本理论“完全根据我们先圣的学说，并且都是孔学的真谛”。至于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指“将我们固有的道德提倡恢复起来，所谓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这里几个字是孔子所常常讲的”，“可以知道国父所倡民族主义，有渊源于孔子学说者”。民权主义“与孔子学说息息相通”，孔子思想中的“君轻民重”以及“天下为公”，正是孙中山民权主义的来源。民生主义与“儒家学说的关系，更为密切。儒家所欲造成的社会，有大同与小康之别”，实际上即“平均地权，节制资本”，部分“从孔子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小康思想中得来。^[56]由此可知，三民主义多出自古时圣贤孔子学说，孔子思想成为解说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工具。

四、结语

抗战时期国民党与国民政府利用传统创制孔子诞辰纪念日，为塑造政权的合法性和统治的权威性，

对孔子思想和学说进行了符合时代要求的阐发。不过，社会层面在一定程度上未能准确理解国家目的。有论者针对官员对孔子思想的现代阐释，指出“这却恢复民族固有精神和自信的一种重要举动，很值得我们赞佩的。但是这种仪式上的尊崇，还不如更进一步为教义上的尊崇，比较容易获得实际的效果”，^[57]与诠释孔子思想的时代精神相比，更主张回归孔子本义。且有人认为“先师孔子名尊重，诞辰纪念如风行，圣教从此远，国学从此兴，人心风俗从此厚”。^[58]论者从民间社会角度强调人心风俗的变化，似乎在举行孔诞纪念后，孔子、孔学即受到尊重。诸如此类认识多基于社会立场，与国家层面纪念孔子诞辰的政治性目的存有差异。

更何况，孔子诞辰纪念日这一“传统的发明”在民间社会难以生根发芽。唐弢用讽刺的语调描述1934年首届孔子诞辰纪念日在山东的祀孔场景：纪念“最起劲的自然还是圣地——山东，政府派大员，路局备专车，贴标语，喊口号，拥拥挤挤，还有老百姓在内，然而看热闹的。这样‘官民协力’的盛况，也还是好久不曾见到了”。^[59]论者道出政府与社会的态度差异，表明纪念日的预期效果与实际成效存在一定距离。这种距离实际上也是近现代中国社会官民的距离，民众仅仅将自己视为孔子诞辰纪念的旁观者，而非纪念活动的参与者，虽然在“看热闹”的同时也深受影响，但本质上意味着国家“规训”的失败，未能达到纪念日政治目标。国家操演孔子诞辰纪念仪式的实际成效有限。国家纪念日并非孤立的单独物，必须与当时的政治理念、社会环境、群众心理等结合到一起，才能发挥出应有的效果。

[参考文献]

- [1] [英] 霍布斯鲍姆、兰格编：《传统的发明》，顾杭、庞冠群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第1-17页。
- [2] [英] 安东尼·史密斯：《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叶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88页。
- [3] 郭辉：《抗战时期民族扫墓节与民族精神的建构》，《史学月刊》2012年第4期。
- [4] 璩鑫圭、唐良炎编：《学制演变》，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597页。
- [5] 蔡元培：《对于新教育之意见》，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36页。
- [6] 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第302页。
- [7][8][11] 韩达编：《评孔纪年（1911—1949）》，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4-5、9、18页。
- [9] 《临时大总统令》，《政府公报》1913年第406号。
- [10] 《内务部关于众议员罗永绍等为祀孔典礼令未经国会议决违反约法信仰自由问题致国务院复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3-4页。
- [12] 《教育部致各省都督民政长等电》，《政府公报》1913年第499号。
- [13] 《祀孔案审查报告书》，《孔教会杂志》1913年第11号；转引自李俊领：《中国近代国家祭祀的历史考察》，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第70页。
- [14] 《大总统发布规复祭孔令》，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第6页。
- [15] 《福建省杨树庄转石屏藩等呈请中央通令各省祭孔代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文化（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515页。
- [16] 《废止春秋祀孔旧典》，《申报》1928年2月22日第3张第10版。
- [17] 《绅学界上丁祀孔礼节》，《申报》1928年2月29日第4张第15版。
- [18] 《四川省东川道儒教分会要求读经崇圣反对废止春秋祀孔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文化（二），第519-521页。
- [19] 《为详释废止祀孔通令由》，《大学院公报》1928年第9期。
- [20] 《内务部公布孔子纪念日》，《申报》1928年10月8日第2张第7版。
- [21] 任福黎：《乙亥夏历孔诞祭祀纪念册》，长沙：长沙孔道学校，1936年铅印本，第1-2页。
- [22] 郭辉：《抗战时期“九一八”纪念的历史考察》，《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3年第2期。
- [23] 徐国磊：《1934年南京国民政府纪念孔子诞辰纪念活动的历史考察》，成都：四川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

第 29 页。

- [24] 邵元冲：《孔子之人格与时代精神》，《大公报》1934 年 8 月 27 日第 3、4 版。
- [25] 《教部令知孔子诞辰纪念》，《申报》1934 年 7 月 13 日第 4 张第 14 版。
- [26][54] 《孔子诞辰纪念办法》，《申报》1934 年 8 月 11 日第 4 张第 13 版。
- [27]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发〈孔子纪念歌〉明令》，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 5 辑第 1 编文化（二），第 531 页。
- [28] 《举国庆祝孔诞》，《申报》1934 年 8 月 28 日第 3 版；《曲阜祭孔典礼志盛》，《申报》1934 年 8 月 30 日第 3 张第 10 版。
- [29] 《孔子诞辰纪念会》，《中央日报》1935 年 8 月 28 日第 1 张第 3 版。
- [30] 《各地举行孔子诞辰纪念会》，《申报》1935 年 8 月 28 日第 3 版。
- [31] 《昨日孔诞中央国府合并开会纪念 曲阜亦盛大举行》，《大公报》1936 年 8 月 28 日第 1 张第 3 版。
- [32][48] 《中枢联合举行孔子诞辰纪念》，《申报》1939 年 8 月 28 日第 2 张第 6 版。
- [33][40] 《全国各地热烈庆祝孔诞》，《申报》1940 年 8 月 28 日第 4 版。
- [34] 《中枢举行纪念孔子诞辰会》，《申报》1941 年 8 月 28 日第 4 版。
- [35] 《先圣遗训与三民主义的关联》，《中央日报》1942 年 8 月 27 日第 3 版。
- [36] 《中枢纪念孔诞 孔委员报告》，《中央日报》1943 年 8 月 28 日第 2 版。
- [37] 《教育部关于拟定先师孔子诞辰为教师节呈与行政院批令》，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 5 辑第 2 编文化（二），第 581-582 页。
- [38] 《孔诞与教师节分别纪念》，《申报》1939 年 8 月 27 日第 2 张第 8 版。
- [39] 《本市各级学校今日纪念孔圣诞辰》，《申报》1940 年 8 月 27 日第 2 张第 8 版。
- [41] 《孔子诞辰中枢今晨开纪念会 教育部纪念教师节》，《中央日报》1943 年 8 月 27 日第 2 版。
- [42][46] 《昨日先师孔子诞辰》，《申报》1934 年 8 月 28 日第 3 张第 10 版。
- [43][45][49] 恒：《纪念孔子》，《申报》1934 年 8 月 27 日第 3 张第 10 版。
- [44] 吴铁城：《尊孔论》，《申报》1934 年 8 月 26 日第 4 张第 15 版。
- [47][51] 《京党政机关今晨举行先师孔子诞辰纪念会》，《中央日报》1934 年 8 月 27 日第 2 张第 1 版。
- [50] 周荫棠：《孔学之双轨——为廿四年孔子诞辰纪念作》，《中央日报》1935 年 8 月 27 日第 3 张第 3 版。
- [52][53] 《昨日纪念孔子诞辰 到二百余人由袁野秋报告》，《中央日报》1934 年 8 月 28 日第 1 张第 3 版。
- [55] 张道藩：《三民主义与儒家学说》，《中央日报》1943 年 8 月 27 日第 3 版。
- [56] 《先圣遗训与三民主义的关联》，《中央日报》1942 年 8 月 28 日第 3 版；张道藩：《三民主义与儒家学说》，《中央日报》1943 年 8 月 27 日第 3 版。
- [57] 赵铁肩：《孔子教义与良好政府》，《大公报》1934 年 8 月 29 日第 1 张第 3 版。
- [58] 韩同甲：《崇经方为尊孔 克己始能治人》，《大公报》1935 年 8 月 27 日第 4 张第 13 版。
- [59] 唐弢：《关于祀孔》，《唐弢杂文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 年，第 111 页。

责任编辑：杨向艳

on the change, but also need to lower the negative effect of uncertainty to reduce resistance.

A Research with Substantial Evidences on Agricultural Infrastructures and Grain Production Force, Taking Jilin Province (1989–2012) as the Case

Xie Xiaorong and Li Xue 91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Jilin province from 1989 to 2009, this paper empirically studi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gricultural infrastructure and food production.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investment level of agricultural infrastructure from various regions of Jilin province has stable and long-term economic effect on food production. In the process of comparative analysis, the long-term economic effect on food production of agricultural machinery and irrigation infrastructure is significantly greater than power facilities. Based on the conclusion and combined the reality, we put forward some policy suggestions.

The Late Ming Dynasty and the Studies of the Late Ming History

Liu Xiaodong 98

The late Ming dynasty is a concept which is bestowed with a unique connotation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current research. But this concept frequently appeared in the works of the Qing dynasty only as a habitual representation of time record. The complicated connotation of the late Ming dynasty is prominently beneficial to the characteristic of the time, but it potentially contains a risk of changing the research problem to research model at the same time. If we were excessively indulgent in modernization obsession, we would easily neglect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vitalities of China's history itself. Return to the intrinsic connotation of the late Ming dynasty maybe can provide some new thinking and enlightenment to today's Studies of the Late Ming dynasty.

A Study on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Focused on the Setting of Confucius's Birthday Anniversary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Guo Hui 104

In the response to the national crisis, the Kuomintang set Confucius's birthday anniversary on the eve of the comprehensive outbreak of the Anti-Japan War, which provided spiritual support for the resistance of the War as the result of new form and rich meaning, compared to the traditional rituals. The holding of the memorial activities both in Qufu and Nanjing expressed the memorial of Confucius and the use of traditional culture which was represented by Confucius. Confucius' thought was reinterpreted scalably, and produced a close contact with the restoration of national self-confidence, the policy of resisting foreign aggression after stabilizing the country, the new life movement, and Sun Yatsen's three people's principles. But the anniversary was just used to provide resources for Kuomintang's legitimacy and authority in maintaining the normal ruling order in the national crisis.

Art Ethnography as a Poetical Interpretation of Local Cultures, on the Writing of 'Noa Noa' as the Case

Peng Xiuyin and Wu Zhendong 140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methodology of writing ethnography of art, focusing on three main aspects. First, what do the embers of humanity in the texts of ethnography mean to the writing of art ethnography? The answer lies on poetic narration, which could get a thick description of art. Secondly, how could the artists give a poetic interpretation of local cultures, based on their own aesthetic experience in the field research? Thirdly, how do the inner tensions of poetic narration bridge the gap between life and art so as to build an interactive relation of understanding and writing, trans-textuality and meta-textuality. Meanwhile, by analyzing "Noa noa", the notes of Paul Gauguin in Tahiti, it appeals a necessity of adopting the method as a discipline on writing of alien culture.

The Causes Led to the Founding of Guangdong's Painting Society

Chen Wei-an 154

The establishment of Guangdong Painting Society rooted in gentle meetings among scholars, relevant to the growing influence by the 1923 Painting Society. The first Guangdong Fine Art Exhibition, the founding of Guangzhou Municipal Fine Art School, and the polarity between eclecticism who promoted artistic revolution and the traditional painters, all helped intensify the necessity of establishing Guangdong Painting Society. Under a constant cultural shock between domestic and foreign, traditional and contemporary, modern Chinese intellectuals were strongly aware of an unexpected crisis and consciously abandoned outdated traditions. Eventually, the 1923 Painting Society of elegant scholars evolved into Guangdong Painting Society with academic values of researching, rejuvenating Chinese painting and enhancing traditions.